

# 元代文人“和陶诗”创作动机研究

张 丽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淮北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1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3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30日

## 摘 要

元代文人时常追和酬唱前人诗歌，其中陶渊明是元人追和的“热点”诗人。元代承袭了宋金的“慕陶之风”且社会背景复杂，元代文人难以入仕治世，转而创作诗词歌赋，同是有着朝代更迭、辞官归隐等人生经历的陶渊明更容易引发诗人们的情感共鸣，元代文士结合自身境遇创作了众多的“和陶诗”。另一方面，陶渊明不仕新朝、固贫守穷的气节深受元代文人推崇敬仰，陶诗自然质朴、平和冲淡且蕴含了浓厚的隐逸情怀，契合了元代文士的审美追求与精神诉求，元代文人喜爱陶渊明及其诗歌，遂追和陶诗。多重因素彼此交织，最终推动和陶诗在元代诗坛蔚然成风。

## 关键词

元代文人，陶渊明，和陶诗，创作动机

# Research on the Creative Motivation of Yuan Dynasty Literati in “Imitating Tao’s Poetry”

Li Zh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Received: June 21, 2026; accepted: July 23, 2026; published: July 30, 2026

## Abstract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literati often imitated and responded to the poetry of predecessors, with Tao Yuanming being a “hot” poet among them. The Yuan Dynasty inherited the “admiration for Tao” trend of the Song and Jin dynasties, and given its complex social background, it was difficult for Yuan literati to enter government service and govern the world. Instead, they turned to creating poetry and lyrics. Tao Yuanming, who had life experiences such as dynastic changes and resigning from office to live in seclusion, was more likely to evoke emotional resonance among poets. Yuan literati combined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to create numerous “imitation poems of Tao Yuanming”. On the

other hand, Tao Yuanming's integrity in not serving the new dynasty and remaining poor and indigent was highly respected and admired by literati in the Yuan Dynasty. Tao's poetry, which is natural, simple, gentle, and dilute, yet contains a strong sense of seclusion, resonates with the aesthetic and spiritual pursuits of Yuan literati. They loved Tao Yuanming and his poetry, and thus imitated his style. Multiple factors intertwined, ultimately promoting the popularity of Tao's poetry in the Yuan Dynasty's poetry scene.

## Keywords

Yuan Dynasty Literati, Tao Yuanming, Poems Imitating Tao Yuanming, Creative Motiv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追和酬唱备受元代文人的青睐，元代有 126 位诗人参与追和，作追和诗 1017 首。元人对唐及唐以前的诗人诗作尤为偏爱，宋金次之。陶渊明和苏轼二人受众范围较广，是元人诗词追和活动中的“热点”诗人，“尤其是陶渊明，以 333 首列元人追和对象之首”[1]。元代追和陶渊明诗歌的诗人有刘因、郝经、方回、戴良、童冀等。学术界目前已有较多学者关注“和陶诗”并对其进行研究，如左东岭学者的《元末明初和陶诗的体貌特征与诗学观念——浙东派易代之际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深入探究元明之际具有复杂思想指向和丰富情感内涵的“和陶诗”，展现了元明之际“和陶诗”冲澹自然的体貌特征、沉郁顿挫与闲淡高雅兼有之的诗学观念。王芳学者的《论刘因的〈和陶诗〉》重点分析了元初北方社会盛行的隐逸思潮及刘因对儒家文化和社会的关怀。王丽娜学者的《论郝经的慕陶情结——兼论元代和陶诗》整理了元代的“和陶诗”并探究了郝经的 118 首“和陶诗”。

左东岭学者探究了戴良、童冀、桂彦良等多个和陶诗人并从中归纳出元明之际的“和陶诗”的体貌特征与诗学观念，目前学术界关于研究元代“和陶诗”的文章更多是重点分析某一个“和陶”诗人及其诗歌，暂时还没有学者从探究元代文人“和陶诗”的创作动机这一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和分析。元代文人学士追和陶诗或受宋金以来慕陶风尚浸染，或因亲历时代动荡、宦途困顿而生发情志共鸣，亦或是出于对陶渊明其人其诗发自内心的推崇与喜爱。元代和陶诗作的创作动机大致可划分为上述三个层面。

## 2. “和陶”诗潮和时代社会背景

### (一) 宋金以来的“慕陶风气”

陶渊明(365~427)，号五柳先生，一生曾五次出仕，担任彭泽县令八十日后他辞官归隐，与山野闲云作伴。陶渊明生前寂寂无闻，去世后的几百年文人学士陆陆续续关注到陶渊明及其诗歌。早在唐代，已有不少诗人效仿、模拟陶渊明的诗作。发展至宋代，更是涌现出苏轼、苏辙等追和陶渊明诗作的文人。苏轼有言：“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於吾。吾於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2]苏轼与其门下士人对陶渊明的推崇使得慕陶风气向北流传、落地生根。

元好问作为金末元初北方文坛的领军人物，其诗文之中屡屡彰显对陶渊明的推崇，《虞乡麻长官成趣园二首》有云：“柴车君来隐，清风动林藪。至今溪上诗，往往在人口。渊明不可作，此士宁复有。”[3](26 页)在此诗中元好问借咏友人归隐之园慨叹陶渊明那样的高洁隐士千载难逢，直白抒发了对陶公的

无限仰慕。他的《后饮酒五首·其五》则通过辨析“人”与“酒”的取舍，盛赞陶渊明于酒中体悟自然、物我两忘的旷达境界：“我爱靖节翁，于酒得其天。庞通何物人，亦复为陶然。兼忘物与我，更觉此翁贤。”[3] (19页)可见元好问是发自内心地倾慕渊明超然冲淡的生命境界。

继元好问大力推崇陶渊明、推动元代慕陶风尚盛行后，郝经、刘因等元代文人深受其慕陶思想熏陶纷纷追和陶诗，并在声韵体制、典故运用、意象建构以及情感主旨等层面完成对陶诗的继承与开拓，刘因《和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便是极具代表性的和陶作品。在用韵与体制上，刘因遵从陶诗的五古体制，通篇一韵到底，不换韵、不刻意雕琢声律，承续了陶诗韵律平缓自然、质朴浑成的审美特质。用典层面，二者皆以隐逸文化为核心内核，但取舍截然不同。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4]两句所用的“羁鸟”和“池鱼”皆是浅白质朴、取自日常的喻象，诗人借此直抒胸臆，袒露厌弃官场尘俗、渴望归居田园的本心，全诗不堆砌生僻典故，语言直白真切。刘因则在《和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中化用前代隐逸典故：“东邻汉阴圃，西家鹿门田。前通仇池路，后接桃源间。”[4]诗中融汇了汉阴丈人、鹿门隐士、仇池仙境、桃源秘境等隐逸符号，刘因把一己归隐情怀拓展为历代隐士相通的精神共鸣。

意象构建上，刘因承袭了陶诗田园隐逸的核心意象体系，但与陶诗中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烟犬吠等写实意象不同，《和归园田居·其一》中的意象则偏向理想化、虚拟化。诗中少有描摹具体的乡村劳作场景，反而勾勒“羲皇前”“小国乐”这类上古太平隐逸图景，构筑出脱离现实的精神隐逸乌托邦，刘因此举是对陶诗写实田园意象的创造性改造。从情感基调与创作动因来看，二人隐逸情志虽一脉相通，却因所处时代不同生出截然不同的内涵。陶渊明笔下的《归园田居·其一》是挣脱官场尘网束缚终得以回归本真的真切抒怀，全诗充盈着返璞归真的松弛与恬淡。反观刘因，其诗作乃是仕、隐两难的感慨悲叹。身逢王朝更迭的乱世，人生道路皆难以自主，《和归园田居·其一》褪去了陶诗从容闲适的底色，借“归田谁独闲”“论说徒纷然”两句述说易代文人进退失据、欲隐难隐的烦闷和愁苦。

承袭宋金绵延不绝的慕陶传统，隐逸之风在元代文坛较为盛行。超然守拙的陶渊明成为元代文人争相追和的精神典范，身处乱世、遁迹山林的文人墨客读陶诗、慕陶诗，追和陶诗以此倾诉自己的想法、抒发内心的情志，元初大儒刘因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数量较多的和陶诗作也由此在元代诗坛占据了重要位置。

## (二) 元代特殊的时代社会背景

宋、金、元三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王朝并存、递嬗更迭的典型阶段，此间战事连绵。至1279年平定南宋，天下复归一统。元朝由北方边疆族群入主中原完成大一统，其治国体制、文化格局与此前中原一脉相承的历代王朝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元朝的一个国策，是将人群分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5] (89~90页)身逢世代迁易，加之元代社会族群规制存在层级区分，士人经由仕途实现人生理想的路径遍布阻碍，心中不免生出归田避世之思。在一众书写隐逸情志的前代先贤里，同样饱经时代更迭之离乱的陶渊明尤受时人推崇，故而元代文士多效仿陶体、创作和陶诗作。

除上述区别化的族群管理规制外，元代还曾长期停废科举，“延祐元年(1314)虽恢复了科举，但通过科举取士的人数远不能与唐宋相比，而且时断时续。”[4] (29页)取消科举对于文士来说无疑是掐断了入朝为官的最后一丝希望，元代文人虽有为避祸远害或喜爱山野生活主动归隐的，但大多数文士还是被迫归隐、不得不隐。科举废止虽阻断文人入仕之路，“然而，取消科举却正是元代诗歌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6]元人陈栌《吴端翁诗跋》言：“迨科举停，而诗复兴。”[7]陆文圭《跋陈元复诗稿》亦云：“科场废三十年，程文阁不用，后生秀才，气无所发泄，溢而为诗。”[5]元代文人学子无法继续上考场尽情“泼墨”，只能另辟他路，转向民间个人创作，此举促进了元诗的进一步繁荣。

宋金以来绵延的慕陶风气催生了元代数量繁多的和陶诗作，而王朝更迭的动荡时局、科举长期停

废等特殊社会背景进一步促使文人依托追和陶诗抒发内心情志。以刘因为代表的元代文人虽在诗歌体制、写作笔法上效仿陶渊明，却对作品精神内核作出全新开拓，这一创作特征在元代文士之中具有普遍性。由此可明晰元代文人追和陶诗的深层用意：依托陶渊明构建的隐逸精神脉络，书写乱世之中进退失据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苦闷。也正是这种书写，让传统和陶创作承载起专属于元代的独特时代内涵。

### 3. “和陶”诗人与陶渊明人生境遇相似

除了承袭宋金以来的慕陶风气和受时代社会背景变化的影响外，元代文人热衷追和陶诗的另一核心原因是他们与陶渊明有着高度相似的人生经历。元代士人受制于当时的制度环境，难以借仕途施展胸中抱负，诸多文人一如陶渊明或安守草野、不愿投身宦途，或短暂出仕后便选择辞官归隐。这批文人皆与陶渊明有着共通的人生境遇，故而对陶诗蕴含的情志意蕴深有体察，极易产生精神层面的共鸣。

#### (一) “和陶”诗人的仕与隐

陶渊明一生五度出仕，最终仍是选择辞官归隐。初北方大儒、诗文名家刘因与陶公的仕途际遇有相似之处。元十九年刘因应诏入朝，后因母疾辞官；元二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再度下旨征召，刘因以疾推辞，转向潜心著述与授业不再涉足朝堂。忽必烈称刘因为“不召之臣”。刘因离世后，朝廷追赐谥号“文靖”。

刘因晚年创作了七十六首《和陶诗》，这组《和陶诗》是诗人身处与陶渊明相近的人生境遇、深悟陶诗内蕴之后所作。在刘因短暂居官期间从未放弃对黎民百姓的关切和对政治清明的期盼，然当其丁继母忧居丧之际，推崇汉地文治的皇太子真金骤然离世，忽必烈复置尚书省，朝中力主汉法之臣亦接连遭受倾轧，朝堂局势日渐纷乱，刘因深知自身治国抱负再无施展空间。洞悉宦途浮沉之后刘因一如陶公主动选择归隐，虽归隐仍有自己的坚守，“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sup>[8]</sup>，其人生旨趣与陶渊明一脉相通。清贫隐居岁月之中，刘因视陶渊明为精神知己，他在《和饮酒》之十中写道：“平生御穷气，沮丧恐无余。长歌以自振，贫贱固易居。”<sup>[9]</sup> (493页)此四句直抒诗人安贫守道的内心操守，与陶渊明《饮酒》组诗甘于贫寒、不慕荣利的胸襟遥相呼应。仕途失意、物质生活匮乏难捱并未消磨其心志，刘因效仿陶公以诗歌自勉，借吟咏舒展胸中意气，在清苦平凡日常里寻求精神安顿。

刘因短暂出仕后便辞官归隐，也有先隐后仕同样以陶渊明为精神知己的元代诗人，例如童冀。童冀，字中州，元末明初诗人，一生辗转各地方教职。隐居浙江金华时童冀有《前和陶诗》，在北平任职做官时期他创作了《后和陶诗》，两者之间相隔约三十年。《拟古》其九言：“我昔在田野，曾和渊明诗。俯仰三十年，不谓身见之。”<sup>[10]</sup> (377页)三十年前的“和陶诗”是在隐居生活中写下的，彼时尚且不解其深意，人世间沉浮俯仰三十年后童冀才真正体会到陶渊明隐居的感受。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善待文儒，及至海内安定，其治臣之法渐趋严苛，一时间众多文臣蒙受灾厄。童冀不是没有想过辞官归隐，但他多次请辞都没有被准许，暮年更是背井离乡、异乡为官。童冀的“和陶诗”有和陶渊明诗歌韵脚，也有和其韵亦和诗歌内容的，正如他的《后和陶诗序》所言：“余往年尝一和陶靖节诗，俯仰垂四十年，浮云世事，何所蔑因哀而目之曰《后和陶诗》。然余前所和者，多因其事而寓己意，今所和者，第用其韵，不复用其事云。”<sup>[8]</sup> (366页)洪武二十二年，时年六十五岁的童冀依旧漂泊羁旅，暮年已至，昔日故交又相继离世，这一时期的“和陶诗”大多抒发诗人尘俗奔波之苦和归田隐居的殷切期盼，如《杂诗十一首》其十一：“俯视南雁飞，缅焉怀故乡。吴葛已十暑，楚砧亦三霜。宁知衰暮年，转觉归路长。”<sup>[11]</sup>大雁尚且可以返乡，自己离家数载却仍旧奔波在路上，思乡之情不可谓不浓厚。步入晚年的童冀，更能共情陶渊明避世归耕的心志，深谙陶诗中安隐自守的人生理想。

陶渊明诗歌中的隐逸思想激起了元代诗人的情感共鸣，进而促使其创作“和陶诗”。王恽也和刘因、童冀一样渴望归隐山林，诗人曾在《和渊明归田园序》中交代他和陶诗的缘由：“辛卯三月十七日，风物

闲暇，偶游溪曲，眷彼林丘，释然有倦飞已焉之念。城居嚣杂，会心者少，因和渊明《归田园》诗韵以寓意云。”<sup>[12]</sup>年老多病、百念灰冷的王恽厌倦复杂的官场生活，喜爱闲适宁静，陶诗中展现的隐居生活是他所渴望的，诗人抒发内心感慨，希望回归到美好自然的田园生活中，遂作“和陶诗”。元代“和陶”诗人无论出仕还是归隐，皆能在陶渊明身上照见自身相似的人生境遇，故而纷纷追和陶诗，借以抒怀明志，袒露自己的精神志趣与人生理想。

## (二) 守旧自持之志

陶渊明是诗者，是“隐者”，同时也是一位有着前朝守节情怀的志士。陶渊明于晋宋易代之后坚辞刘宋征召，终身遁迹山林、守志不仕。后世历经朝代更迭不愿出仕新朝的文人墨客追随着陶渊明，他们以渊明为精神依归，追摹其行迹、追和其诗作，如吴皋、邓雅、戴良等，其中戴良是追和陶诗数量较多、艺术成就较高者。

戴良字叔能，号九灵山人，少时学文于柳贯、黄潛，学诗于于闕，皆得真传。后世事动乱，戴良携家隐居四明山。四明山水秀丽，有众多儒生集聚，戴良和他们“宴集为乐”，饮酒赋诗。然“洪武壬戌，召至京师，赋文词若干篇，留会同馆，命大官给膳。欲官之，以老病固辞，忤旨待罪。”(顾嗣立《元诗选》)<sup>[13]</sup>明太祖朱元璋召戴良入京欲授其官职，戴良坚辞不赴，固守一身出处之节，“次年四月，卒于寓舍，年六十七。”<sup>[12]</sup>戴良和宋濂同是柳贯、黄潛的门生，宋濂选择出仕新朝，而戴良却选择了隐居四明。戴良曾在其《九灵自赞》云：“处荣辱而不二，齐出处于一致；歌黍离麦秀之音，咏剩水残山之句。”<sup>[14]</sup>(206页)“黍离麦秀”和“残山剩水”乃是形容山河破碎、王朝更迭的风物景致，自言其诗抒发易代兴衰之感，可见诗人始终秉持追念前朝的心志。戴良将同样遁迹山林、固守己志的陶渊明奉为其精神向往，继而慕陶、咏陶、追和陶诗，在诗中寄托自身心志与人生操守。

相似的身世遭际更容易引发情感共鸣，追和陶诗也由此成为戴良排遣郁结、安放自我的重要途径。戴良追和陶公的诗作共计51首，包括《和移居二首》《和拟古九首》《和杂诗十一首》和《和饮酒二十首》等，另有一篇《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元末割据四起，兵戈连年不息。元室倾覆之后戴良无意出仕新朝，平生济世之愿无从施展，诗人胸中遂满含身世浮沉之悲与世事变迁之慨。戴良的“和陶诗”与陶诗相去甚远，陶诗超然物外、从容自然，而戴良的诗歌则是借陶诗以抒发内心的郁闷苦涩、凄凉失落。如《和饮酒诗》其三：“渊明旷达士，未及至人情。有田惟种秫，似为酒中名。过饮多患害，曷足称养生。此生如聚沫，忽忽风浪惊。沉醉固无益，不醉亦何成。”<sup>[13]</sup>(275页)明知沉醉无益，但现实生活残酷冷漠，不醉又能如何，故而饮酒以逃避清醒时的痛苦。戴良的“和陶诗”还兼具沉郁顿挫与高雅闲淡，王祯的《浦阳戴先生诗序》赞赏戴良的诗曰：“叔能之诗，质而敷，简而密，优柔而不迫，冲澹而不携，庶几上追汉魏之遗音，其复自成一家者欤。”<sup>[15]</sup>

## 4. 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仰慕与推崇

元代文士与陶渊明的人生轨迹多有相通之处，或身逢朝代更替，或辞官归隐，相似的生命境遇促使彼时士人在“慕陶风气”下更加推崇陶渊明，纷纷追和其诗作。陶渊明通达旷放，兼具鄙弃浮名、不逐尘宦的自持操守与安贫守道的高洁品性，自身人格极具感染力，为后世众多文人所追慕。加之其诗作语言质朴自然、气韵平和冲淡，艺术特质鲜明，诗中承载的隐逸情怀独树一帜，其人其诗长久为历代文士所喜爱。

### (一) 对陶渊明的仰慕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sup>[16]</sup>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直白流露对陶渊明恬淡旷远襟怀的赞赏之情，对其豁达自守、安贫乐道的处世旨趣深表认同。他追和陶诗本心便是倾慕陶渊明的风骨人格，自言“欲

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17]。

郝经，字伯常，元初北方儒士，亦是和陶诗创作的代表人物。中统元年，郝经奉命出使南宋，南宋丞相贾似道唯恐其谎报军功之事败露，遂将诗人拘禁于真州长达十六年。羁囚生涯中郝经愁苦万分，日夜期盼归乡，陶渊明挣脱官场桎梏、毅然归耕田园的抉择以及淡泊荣禄、坚守隐逸本心的清高气骨令诗人心生景仰，奉其为立身楷模。幽囚真州的漫长岁月里，郝经前后创作 118 首和陶诗借以寄托平生心志。其《和陶诗序》曾慨叹《诗经》之后虽“潘、陆、颜、谢，鼓吹格力，复加藻泽，而古意衰矣”[18]，身处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天资高迈，思致清逸”，超然于世俗纷争之外，与世无争。郝经被陶渊明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结合自身羁留南宋、身陷囹圄的坎坷境遇，写下这百余篇和陶之作。“故国日已久，朝暮但神游”[13] (273~274 页)，元末寄迹山林、守志不仕诗人的戴良，同样折服于陶渊明不慕宦荣、守志归田的高风亮节。郁积心中的愁苦需寻宣泄之途，是以他在看似闲逸超然的和陶诗作中寄寓年华老去的沉郁心绪，如“嗟我在世中，倏忽已华颠”[13] (273~274 页)和“前途无由骋”，皆饱含身世迟暮、前路难觅的悲慨之情。

除了仰慕陶渊明通达旷放的人生态度与坚守本心、不慕官禄的坚贞操守，元代文人还钦佩陶渊明安贫守道的高洁节操。陶渊明的《有会而作》中写到自己少时家境穷苦，晚年更是挨饿，不敢奢望佳肴美食，能饱腹就已经很满足了。在如此窘迫的生活中陶公仍能看见世间善意，感叹“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19]，也不曾在逆境中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认为“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15] (1745 页)感慨饥寒贫苦不足为惧，古往今来向来不乏坚守操守、安贫守道之人。

陶渊明辞官归隐后晚年生活非常清贫，《乞食》就是诗人饥苦难耐出门乞食感念主人的慷慨解囊情有所动后写成的。《南史·陶潜传》记载江州刺史檀道济曾亲自拜访陶渊明并赠给他米、肉，然陶公挥手拒绝，彼时陶公还在病中，固穷守节之志可见一斑。刘因晚年因家中粮食没有粮食，幼儿啼哭，甚至想过向他人借贷，由此可知刘因晚年生活实在困窘。清贫如此刘因却也和陶渊明一样坚守君子固穷之志，他的《和乞食》云：“好廉中无食，触事或发之。万钟忘义理，一簞形色辞。吾贫久自信，笑听沟壑来。”[9] (242 页)。漂泊十年，居无定所，而今又只能栖身于简陋的住所，身心俱疲。“寒蔬挂庭柯，风叶满鹿席”[9] (242 页)但诗人以儒家的安贫乐道自励，床头放着“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填补空暇，同时也承担日常劳作。尽管现实与理想有很大的差异，但刘因仍是选择在困窘中不移安贫乐道之心，正如他在《和移居》二首中说的：“珍重颜乐功，先贤重剖析。躬耕力不任，闭户传书诗。资生岂师道，舍此无所之。”[9] (242 页)

陶渊明是隐逸文学的代表士人，其超然物外、通达旷放的人生态度，不慕荣利、守拙归田的坚贞操守以及安贫守道的高洁品格深刻影响着后世文人学子。元代文人邓雅、郝经、刘因等正是仰慕陶渊明的品格、气节等从而追随陶渊明并创作了众多和陶诗。

## (二) 对陶渊明诗歌的喜爱

陶渊明诗歌语言质朴冲淡、不假雕饰，题材多取材田园日常，诗作之中寄寓着鲜明的隐逸情怀，呈现出诗人独有的精神理想与人生追求。苏轼对陶诗评价极高：“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2]为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诗歌技法所折服，苏轼进而开展追和陶诗的创作，这一和陶创作范式亦为后世文人承袭并不断拓展。

元好问继承宋金“慕陶之风”，并成为元代和陶诗的重要人物，在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中传达了其对陶渊明的敬仰和赞赏之情：“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南窗百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20]陶诗语言平淡、自然天成，无浮华纤丽的敷饰，真朴淳厚，读起来万古常新，元好问喜爱陶诗并追和陶诗。元好问的弟子邓雅、郝经也和元好问一样，仰慕陶渊明的品格、气节，继而追和陶渊明的诗歌。

邓雅，字伯言，江西新淦人。邓雅在《读渊明诗》中点明了喜爱陶诗的原因，即“渊明本清真，冲澹乃其宜。我性颇淳朴，平生爱其诗。骛驰事鞭策，安得同驱驰。”<sup>[21]</sup> (313 页)他写有数首诗来表达自己的阅读陶诗的感受，展现了当时的文人对陶渊明的仰慕和对陶诗的认知与理解。郝经在他的《和陶诗序》中亦称赞陶诗：“跌宕于性情之表，直与造物者游，超然属韵，庄周一篇，野而不俗，澹而不枯，华而不饰，放而不诞，优游而不迫切，委顺而不怨怼。”<sup>[17]</sup>在郝经看来，陶渊明诗歌闲雅从容地吟咏情性，可谓“独得古诗之正”，古往今来的诗人，少有人能抵达陶渊明这般艺术高度。元代文人邓雅更于《读陶渊明诗二首》中直言自己对陶诗的喜爱，抒发读陶诗所得之感，称陶诗意境高远精妙，愈品读愈觉韵味绵长。诗中“大羹无盐梅，土鼓谐宫商”<sup>[22]</sup> (289~190 页)两句，既表达邓雅对陶诗质朴自然之风的称赏，也流露其对陶诗境界的向往。元代文人钟爱陶诗，是以歌咏陶公、追和陶诗之风盛行一时。

除了元好问、郝经和邓雅外，戴良等元代文人也十分赞赏陶渊明的诗歌。《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序》中展现了与友人游湖赏景、饮酒对酌洒脱自在的场景，戴良明确表示自己“因读渊明《饮酒》二十诗，爱其语淡而思逸，遂次其韵，以示里中诸作者。”<sup>[13]</sup> (274 页)喜爱陶渊明诗歌冲澹自然的体貌，遂作二十首和《饮酒》之作，其十四首有云：“里中有一士，爱客情亦至。生平不解饮，而独容我醉。我亦高其风，往还日几次。尔汝且两忘，何知外物贵。尚惧数见疏，淡中自多味。”<sup>[13]</sup> (276 页)戴良的“和陶诗”与陶诗一脉相承，语言自然畅达、不假雕饰，意境超然淡泊，余味含蓄隽永。

与戴良同为元末隐逸诗人的舒頔，同样推崇陶诗质朴自然的文风，他不仕新朝，归隐山林，《贞素先生自传》就展现了舒頔的隐居生活与洒脱旷达的人生态度。舒頔于贞素斋前栽种花木，四周“环以湘竹”。有清风相陪，三五好友作伴，品蔬肴饮佳酿，闲暇时寄情笔墨，自在闲适。他不在意官场利禄并称：“富贵福泽，皆不足为吾心扰。晋有靖节翁，与予异世而同志也。”<sup>[22]</sup>能守此闲淡心志，实为人生至乐。

元代文士倾心仰慕陶渊明、推崇陶诗，结合自身独特的人生阅历与生命体悟创作大量和陶诗作。此类作品既成为文人宣泄情志、寄托人生理想的载体，亦为明清时期效仿追和陶诗的文人提供了重要的创作参照与文学借鉴。

## 5. 结语

元代文士追和陶渊明诗作的动因，可划分为外部时代背景与士人自身境遇两个层面。就时代背景而言，宋金时期已然盛行的“慕陶之风”加之元代动荡的社会环境共同构成时代底色：干戈屡起，科举取士曾长期中断，朝廷用人之制多有更革，官场风气浑浊；从士人自身角度而言，元代文士多与陶渊明拥有相近的人生际遇，或辞官归隐，或无意出仕当朝，他们与陶渊明心境相通，陶诗极易令一众追和之人产生精神共鸣。再者，陶渊明其人其诗皆具独特魅力和精神感召力。陶公辞官归田不肯屈从俗世权势，又能安贫自持、坚守本心，这般品格历来为后世文人所推重；其诗作语言清真质朴，格调平和冲淡，意境悠远充盈隐逸情怀，深深打动元代一众士人。

当世时局动荡纷乱，胸中济世之志难以施展，追和陶渊明诗作便成为元代文士纾解胸中郁结、安放失意心绪的重要途径，他们推崇陶渊明其人其诗，借唱和之作抒发内心情感，托寓半生理想襟怀。元代文人学士慕陶、和陶，在追和陶诗的同时也树立起自身的诗学取向与精神追求，以此安顿个体的生命情志。置于诗学史脉络中，元代延续并拓展了宋金以来追和陶诗的创作传统，助推“和陶”这一诗歌题材逐步走向经典化。元代文士的和陶创作极大助力了元朝诗歌的发展与丰富，和陶诗亦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体系中极具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参考文献

- [1] 彭健, 姚蓉. 诗歌追和与元人诗学崇尚[J].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2024(1): 238.

- 
- [2] 苏轼. 东坡全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329 册). 台北: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983.
  - [3] 元好问. 元好问全集 上[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 [4] 陶渊明. 陶渊明集[M]. 吴泽顺, 编注.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31-32.
  - [5] 杨镰. 元诗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 [6] 陆文圭. 跋陈元复诗稿, 墙东类稿 卷九[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194 册, 645.
  - [7] 陈栎. 吴端翁诗跋, 定宇集 卷三[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205 册, 190.
  - [8] 梁萧统. 陶渊明集序, 梁昭明太子文集 卷四[M]. 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 台北: 天一出版社, 1980: 54.
  - [9] 刘因. 静修集 卷十二[M]. 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0] 莫友芝. 宋元旧本经眼录 邵亭书画经眼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1] 王征. 明代陶诗接受与批评研究[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21: 87.
  - [12] 王恽, 杨亮, 钟彦飞. 王恽全集汇校[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57.
  - [13] 顾嗣立. 元诗选 二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1039.
  - [14] 戴良. 戴良集[M]. 李军, 等, 点校.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 [15] 王祎. 王祎集[M]. 颜庆余, 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200.
  - [16] 苏轼. 中国古代名家诗文集 苏轼集卷四[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1745.
  - [17] 苏轼.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M]. 李之亮, 笺注.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77.
  - [18] 郝经. 郝经集校勘笺注[M]. 田同旭, 校注.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8: 480-481.
  - [19] 逯钦立. 陶渊明集 卷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06.
  - [20] 元好问. 元好问编年校注[M]. 狄宝心,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48.
  - [21] 杨讷. 元史研究资料汇编 第 70 册[M]. 影印清道光本 邓伯言玉笥集 卷一.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22] 杨讷. 元史研究资料汇编 第 65 册[M]. 影印清道光本 贞素斋集 卷三.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2014: 57.